

闲话文人 张光范

冰心梁实秋的友谊



梁实秋

冰心

冰心与同时代的很多男作家都有君子之交的友谊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，冰心的文章很少提到梁实秋。而在80年代之后，梁实秋在冰心的笔下屡屡出现，这时，我们才知道，原来这两位文坛名宿之间，也有着“不比寻常”的友谊。

冰心与梁实秋的初识，是在1923年1月冰心的新诗《繁星》《春水》出版后，风靡文坛，受到很多文学青年的喜欢，可是梁实秋却不以为然。1923年7月梁实秋即将赴美留学的前夕，他在《创作》周刊上发表了《〈繁星〉与〈春水〉》一文，对冰心的《繁星》与《春水》两部小诗集做了批评。那时两人尚无一面之缘。

梁实秋这样告诉读者：“冰心女士是一个散文作家，小说作家，不适宜于诗；《繁星》《春水》的体裁不值得仿效而流为时尚。”梁实秋的这种诗论当然是一家之言，但在文坛上却是一篇醒目的反调文章。冰心当然也读到了。当时，冰心在文坛上的声望要比梁高得多，被梁批评得一无是处的小诗，正成为很多文学青年模仿的对象。可想而知，梁的这一大篇宏论是很难让冰心服气的。

那篇文章发表后没几天，梁实秋就踏上了去美国的轮船。在这艘船上，经许地山的介绍，他认识了自己刚批评过的冰心。当时他对冰心的印象是，“一个不容易亲近的人，冷冷的好像要拒人千里之外”。

到美国后，梁实秋与冰心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。梁实秋发现冰心“不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，不过对人有几分矜持，至于她的胸襟之高超，感觉之敏锐，性情之细腻，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”。从此，两人开始结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。

不久，在波士顿一带学习生活的中国留学生在当地的“美术剧院”演出了英文版《琵琶记》，剧本由顾一樵改写，梁实秋翻译，梁实秋在剧中饰蔡中郎，谢文秋饰赵五娘，顾一樵演宰相，冰心演宰相之女，演出轰动一时。

两人留学回国之后一度断了联系，直到抗战爆发之后才又重逢。

1940年，梁实秋过生日，冰心应邀参加“寿宴”。酒过三巡后，梁实秋忽然研墨展纸，索要冰心的字。那天冰心喝了一点酒，心境特别好，便提笔欣然写下：

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，不论男人或女人。花有色、香、味，人有才、情、趣，三者缺一，便不能做人家的要好的朋友。我的朋友之中，男人中算梁实秋最像一朵花，虽然是一朵鸡冠花，培植尚未成功，实秋仍需努力！

梁实秋拿到这幅字后极为珍爱，后来一直把它带在身边，直到他在台湾病逝。

抗战胜利后，冰心随丈夫吴文藻去了日本，在高岛屋的寓所里，还特意挂了梁实秋送她的一幅字。1951年，冰心夫妇回到祖国，定居北京，而梁实秋于1949年6月去了台湾。由于海峡两岸局势紧张，两人因此中断了联系。“文革”期间，梁实秋听说“冰心和她的丈夫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了”，这一消息让他非常悲痛，他写了一篇《忆冰心》，用细腻平和的笔触，回忆了两人几十年的友情。

1972年春，梁实秋收到伦敦凌叔华的来信，才知冰心依然健在。而后来，这篇文章也辗转到了冰心手里，她看了十分感动，立刻写了一封信，托美国友人转给梁实秋。信中说：那是谣言，感谢友人的念旧，希望梁实秋能够回来看看。梁实秋感慨万

千，欣慰之余，又提笔写了更正文字，并将文章收入散文集《看云集》中。

冰心期待着梁实秋能回大陆来看看，结果等待而来的不是离开家园40年的风雨故人，而是梁实秋于1987年11月3日在台湾病逝的噩耗。令人深感痛惜的是，梁实秋原拟第二年回大陆探亲访友。当冰心从梁实秋在北京的女儿梁文茜那里得知旧友逝世的消息后，十分痛心。这位当时已是87岁高龄的老人，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，和泪写了两篇悼念文章：《悼念梁实秋先生》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，《忆实秋》发表在《文汇报》上。

晚年冰心出版的《关于男人》一书里说：“我这一辈子接触过的可敬可爱的男人的数目，远在可敬可爱的女子之上。”在这本集子中，收录了那两篇写梁实秋的文章。而当梁实秋的遗孀韩菁女士到北京拜访冰心时，冰心在悲痛中说：“实秋是我的一生知己。”

流金岁月 明斋

郑振鹏先生

追忆三十三年前，余修完大学专业课程后，年仅弱冠即步入社会。初为人师，踌躇满志，不愿误人子弟，务必精益求精，转益多师，教学相长，人以新秀许之，颇露峥嵘气象。当是时也，余不谙世事，性情孤高，心雄万夫，桀骜不驯，虽多有睥睨群僚之举动，而心中亦有服膺之人，其中最为服膺者，惟学校郑振鹏先生。

时先生已年逾六旬，中等身材，体态微胖，慈眉善目，气宇轩昂，其儿女均不在身边生活，只有一位孙辈随其读书，承欢膝下。每日晚间，寂寂人定，星光闪烁，夜风送爽，辄见先生与夫人从居住的平房推门而出，一前一后，沿着校园曲径稳步前行，一圈一圈，脚步坚实而笃定，偶有交谈，亦轻声细语。

“苗大姐，该往回走了。”大约一个时辰之后，先生便轻声唤其夫人道。

“好的。郑君，你前面行。”是苗大姐甜美的声音。

于是，二人便返回居所，仍然是一前一后，脚步稳健，遇人颌首而笑，从不刻意寒暄。先生是世家子弟，就读大学期间即已成婚，从此夫人苗大姐便陪侍左右，不弃不离，恩爱伴随。诗书门第，礼数周全，恩爱逾常，卿卿我我，还表现在相互的称谓上，先生终生敬称其夫人为“大姐”，而其夫人则终生以“郑君”“郑郎”回应。君子风度，名士做派，放在今日，绝对可以成为一道风景。

后来，学校号召青年教师随堂听课，多向老教师请教教学问题，学习授课经验，余首选者即郑振鹏先生。每次前去听课，见先生左手持一册教学用书，右手捏两支白色粉笔，走上讲台，师生问候如仪，然后开始讲课。先生所讲授者为高中三年级历史课程，课堂之上，提纲挈领，要言不烦，循循善诱，有问有答。答对者予以褒赞，答错者及时订正，一章一节，思路清晰，语言流畅，动听悦耳，或幽默风趣，或严谨不苟，关键处切中肯綮，重要处剖析精准，繁琐处抽丝剥茧，难解处条分缕析。一堂课下来，尽管汗珠布满其额头，而态度却极为和蔼，听讲者如沐春风，讲授者亦状极满意。最妙的是先生讲课从来不看教案，严格地说也从来没有教案，满腹经纶，汨汨而泻，排列有序，不容稍误。后来，知情者悄然告诉余等，先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国立河南大学文史学院，曾先后师从冯友兰、段凌辰、稽文甫、范文澜诸位大家，腹有诗书，吞吐才学，融会贯通，自成一家，下的是真功夫，得的是大学问。尽管先生上课不拿纸质教案，但也从不掉以轻心，而是认真准备，绝不姑且，厚积薄发，博约相济。每日晚间，先生负手独行，夫人陪伴左右，旁若无人，状极亲密，风姿翩然，潇洒自如，作野鹤闲云状，其实就是在准备次日的功课，章节要义，重点难点，先后次序，以及紧要之处，一一成竹在胸，面面考虑周详，然后才弛然而

卧，高枕无忧。此种习惯，历数十年从不稍加变更，而教学效果极佳，其平生弟子云集，学界交口称赞，曾位居中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、河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之职，大家风范，名士气度，绝非浪得虚名也。

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个冬日，适逢周末，大雪纷飞，瞬间山河皆白，惟松柏苍翠，冬青吐绿，尚有勃勃生机。余踏雪归来，走进校园，但见校道之上行人匆匆，均作垂首沉默状，心中略有不祥之感，忙询之值班人员，答曰郑振鹏先生不幸辞世矣。闻听之下，心室震颤，心区隐隐作痛，尤其想到两日前还在听其授课，聆其宏论，而昼夜之间，竟然阴阳两隔，世事无常，天意难测，竟至于此，不禁怆然。追思会上，余虽为男儿，然情不自禁，悲伤失度，以泪洗面，流露的是真情感，抒发的是大悲哀。时至今日，弹指之间，三年已逝，风华渐衰，世情已老，然偶一念及先生，其音容笑貌，宛在目前，不禁怦然心动，黯然伤怀。扪心自省，余所深深怀念者，既是一代大家的清贵人品，一代名士的满腹才学，也是一个风雅渐远的时代。

读史侧翼 刘绍义

古代最后一次“高考”



古代高考众生相

看几遍军旅作家王维的《末代状元张謇》，也没有弄明白作者为什么把张謇说成是末代状元。因为在张謇后面还有骆成驥、夏同龢、王寿彭、刘春霖四位状元，末代状元应该是刘春霖。

江苏海门市长乐镇（即今常乐镇）人张謇成为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甲午科的状元，当年的榜眼是湖南省茶陵县人尹铭绶，探花是湖南长沙人郑沅。这次考试后的1895年，荣禄、陶模等人上书变通武举，建议以武学堂取代武举培养和选拔人才。也就是在这一年，李提摩大提出在科举考试中增加新的科目。他认为：“中国科目，意美法良，不可废也。”但“惟题目不广，只讲本国之事，不知各国治平之法”，应该改革。

第二年，即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，由徐桐、启秀、李文田、唐景崇任主考官，科举考试仍在进行，四川资中人骆成驥成为当年状元，浙江黄岩人喻长霖、湖南省湘乡县新安乡三十四都（今双峰县三塘铺镇）人王龙文分别是榜眼和探花。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十一月，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考试时设立经济特科，选拔“或周知天下郡国利弊，或熟谙中外交涉事件，或算学律学，擅绝专门，或格致制造，能创新法，或堪游历之选，或工测绘之长”的人才。康有为也在这一年撰写了《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》一文，指出用八股取士，致使出现“巍科进士，翰苑清才，而竟不知司马迁、范仲淹为何代人，汉祖、唐宗为何朝帝者，若问以亚非之舆地、欧美之政学，张口瞪目，不知何语矣”。但他们说归说，科举考试并没有停止。

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，贵州麻哈州（今麻江县）人夏同龢中戊戌科状元，湖南桂阳莲塘大湾人夏寿田是榜眼，浙江德清人俞陛云是探花。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，两广总督陶模率先提出“废科举以兴学校”，作为“图存四策”之一。戊戌变法时，康有为建议：“请勿下部议，特发明诏，立废八股。”清廷并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，慈禧太后只是重新恢复了被废止的经济特科。1903年癸卯科考试正常进行，也就是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，由孙家鼐等四人任主考官的科举考试。山东潍县（今潍坊）人王寿彭高中

状元，山东莱州人左霁、贵州遵义人杨兆麟分别中榜眼和探花。

紧接着的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，以裕德、张百熙、陆润庠、戴鸿慈为主考官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，河北省肃宁县人刘春霖一举夺魁，成为清朝末代状元，广东清远清城区人朱汝珍、广东番禺人商衍鎤分别成为末代榜眼和探花。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（1905年9月2日），直隶总督袁世凯、盛京将军赵尔巽、两广总督张之洞、两江总督周馥、两广总督岑春煊和湖南巡抚端方会奏《请废科举折》。指出“科举一日不停，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，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”。呼吁停止科举已是迫在眉睫之事。清廷接受了来自举足轻重的南北封疆大吏的建议，决心废除科举考试，以达到延续自身统治的目的。自此为止，具有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宣告结束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中间有的人一边高喊废除科考，一边又不停地参加着科考。徐世昌和袁世凯曾誓言废除科考，但徐世昌还是参加了科考，并中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的进士。好在袁世凯并没有放在心上，两人关系依然很好，在玩弄清政府和孙中山的道路上，相互协助，一唱一和。相比之下，梁启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，他和吴稚晖等人约好不参加考试，但梁启超还是在父亲梁宝瑛和老师康有为陪同下分别参加了1890年和1895年的会试，最后虽然因为主考官徐桐以广东举人考卷中“有才气者必为康祖诰”为由没有录取，但还是导致了吴稚晖和梁启超终生不相往来的最后结局。

写食主义 乔北军

清淡萝卜

菜园里的萝卜成熟了，壮壮实实在立在那儿，犹如乡下丰腴腰身的农妇，很有精气神儿。拔一个洗净，水灵灵的让人忍不住咬上一口，一股甜脆透凉的感觉瞬间荡漾全身。

早在两三千年前，我们的祖先就已知萝卜之美，《诗经》中有“采葑采菲，无以下体”的诗句。“菲”指的就是萝卜。劝告人们不要因其叶的不好看而忽视了其根茎的美味。

汪曾祺在散文《萝卜》中谈到台湾女作家陈怡真来北京拜访他，汪老亲自下厨，其中有一道菜就是烧小萝卜。文中说：“她吃了赞不绝口。那当然是不嫌吃的；那两天正是小萝卜最好的时候，都长足了，但还很嫩，不糠；而且我是用干贝烧的。她说台湾没有这种水萝卜。”

梁实秋有意思，还能从一钵萝卜汤中得出启示，他在《雅舍谈吃》中说杨太太做的排骨萝卜汤堪称一绝：“排骨酥烂而未成渣，萝卜煮透而未变泥，汤呢？热、浓、香、稠。大家都吃得直吧嘴嚼。”从这道萝卜汤中，梁先生悟出了为文之道，只须做到言中有物即可。其实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不能华而不实。

另一个人是弘一法师，竟把吃萝卜与佛道修行联系起来。有一天，夏丐尊去拜访他，吃饭时，法师只一碗白粥配一碟咸萝卜，夏丐尊偶尔一尝萝卜太咸了，想跟法师换换，法师不肯，说，咸有咸的味道，淡有淡的味儿。此话甚妙，人生咸淡两由之，个中滋味只须人去品味。

小时候，物质匮乏，到了秋冬时节，萝卜就成了饭桌上的主打菜，天天吃，吃到后来闻着萝卜味儿就反胃。奶奶生前吃饭时最常说的一句话：“肉是好东西，猪从萝卜地里过一趟，那萝卜都好吃些。”

我至今仍然认为，猪肉烧萝卜是人间美味。母亲做的萝卜干炒腊肉让我百吃不厌。将萝卜干用温水泡后切成段，腊肉清洗干净，上蒸锅隔水蒸后切成薄片。腊肉片炒至出油，随后加入萝卜干、蒜粒、红尖椒、豆豉，翻炒入味后即可出锅。萝卜干吸收了腊肉的油脂，吃起来荤香四溢，腊肉焗炒过后不再油腻，反而更有韧劲，加入的红尖椒和豆豉，非常香辣开胃。